

中外文学关系的史料学研究及其学科价值

葛桂录

跨文化交流语境里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一直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支撑领域，也是取得最好实绩的研究领域之一。我国比较文学界的前辈学者以及近三十年学界时贤在这一领域的杰出成就，昭示着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坚实根基。为使这一领域有可持续拓展的潜力与动力，我们觉得应该加强两方面的研究与探讨：一是文学关系原理与方法的研究与推广；二是文学关系的史料学研究。这是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两条灵动（理论）而坚实（史料）的腿，依靠它们能够在比较文学与文学交流领域走出一方宽阔的天地。本文仅就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做一点初步思考。

一、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史料基础

中外文学关系史或交流史研究，首先属于史的范畴，而史料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坚实的史料基础决定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意义与学术价值。

史料从何而来？清季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¹胡适之先生进一步申说：“从前绍兴人章学诚（实斋），他说：‘六经皆史也。’人家当初都不相信他，以为是谬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句话，其实还幼稚得很。我们可以说：‘一切的书籍，都是历史的材料。’”²在胡适看来，一切古书皆史。因而史料的搜集就成为了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傅斯年先生甚至强调“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³

而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则强调：“史料就等于历史，这是错的。研究历史要有史料，但是史料不等于历史。如同盖房子要有砖瓦，但是砖瓦不等于房子；做衣服要有布帛，但是布帛不等于衣服。把砖瓦变成房子，把布帛变成衣服，把史料变成历史，要经过加工制造的过程。……最好的历史家，没有资料，怎么能写出历史来呢？所以资料是重要的。但是必须声明：史料不等于历史。”⁴对史料进行加工制造，也是问题意识与研究观念或曰史识形成的过程。史料与史识相结合，在特定研究思想下，剪裁史料，分析史料。

史料大体上分为两类：一是原料（原始材料，第一手资料，即 primary sources）或直接史料；二是次料（次手材料，第二手材料，即 secondly sources）或间接史料。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关系如何？傅斯年先生的相关论断可资为鉴：“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英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10BWW008）的阶段成果。

¹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一，《易教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² 《中国书的收集法》，《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64页。

³ 傅斯年著，雷颐点校《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史学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页。

⁴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3页。

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因而，“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不靠较为普遍、略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所以傅斯年指出对“直接材料的了解，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做个轮廓，做个界落。”⁵

不论直接史料抑或间接史料，都要花费大功夫广为搜罗。因为这些文献史料的发现与整理，不仅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同时也意味着学术创新的孕育与发动，其学术价值不容低估。应该说独立的文献准备，是独到的学术创见的基础，充分掌握并严肃运用文献，是每一个文学关系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有经验的研究者对此多有深刻体会：“一个成熟的研究课题，应有相对完整的史料积累，这往往是这个课题研究成败与否的基本条件。”⁶

这方面，鲁迅先生也为我们做出了楷模。我们知道，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曾招致许多非议，其中一条说他的这本著述是以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献概论讲话》“做蓝本”的。鲁迅对此反驳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⁷史料文献如何去独立准备？鲁迅自己说过：“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中国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这种“废寝辍食，锐意穷搜”的精神与意志，大概是每位严谨的治学者不得不具备的。

1933年6月18日，鲁迅致曹聚仁的信中，谈及自己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的写作计划时，说“先从做长篇入手”⁸。此前他论及郑振铎《中国文学史》时，则强调这样的“文学史资料长篇，非‘史’也”，“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⁹由此，鲁迅强调“史识”与“史料”的统一，史料需要史识的照亮，但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却是研究“入手”的基础。钱理群先生谈到自己著书体会时也曾这样说：“每写一部重要著作，一定从史料的独立准备入手。而且据我的体会，随着学术眼光、思路的变化，必然有一批新的史料进入研究视野；而随着史料发掘的深入，新的学术思想与方法也得到了深化，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良性的互动过程。我自觉追求的研究的新意与创造活力，正是有赖于这样的新的

⁵傅斯年著，雷颐点校《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史学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3—5页。

⁶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⁷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页。

⁸鲁迅：《致曹聚仁》（1933年6月18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⁹鲁迅：《致台静农》（1932年8月15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学术眼光，以及被激活的新的史料。”¹⁰

一般而言，在文史研究领域内，比较讲究文献资料的提供。由此推论，衡量一部文学关系研究论著的学术意义，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你给本领域本学科提供了多少新资料、新文献，进而引发多少新问题，展现多少“新的学术眼光”？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曾指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¹¹20世纪初以来，我们各种新学科群的建立，往往得益于极其重要的新史料的发现及新问题的提出。但新史料与传统史料也不能完全无关，正如傅斯年先生所说：“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与遗传者接不上气，亦每每是枉然。”¹²

当然，新材料的发现带有一定偶然性。研究者们更难将自己的研究工作全部寄于新材料的发现上。这样看来，有些新资料并非刚刚挖出来的，而是在新的思路下，有些资料，它会从边缘的、不受重视的角落，变成重要的、中心的资料。于是有些最常见、最一般、最现成的资料，当你用新的观念去阅读时，它便成了新资料，能够给别人提供新的东西。即上文钱理群先生所谓“新的学术眼光”被激活的“新的史料”。因此，读常见书，挖掘常见材料里的潜在史料价值，不失为一种研究方略。¹³其实，史料之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主要看人们的需要和远见卓识。同样一件史料，放在不同的研究者手中，得出的结论和获得的研究成果也不完全相同。

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中，设若文献材料有误，势必会影响整个研究基础与历史描述。严谨的治学者均将文献资料的搜罗、编年，当做第一等的大事。许多研究思路和设想就出之于那些看似零零星星的材料中。因此，提倡史料的搜集与考辨先行，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史料搜集及援引的真实性，乃学术研究的首要基础。这方面，史学界有所谓的“不确实之病”：英国史学家弗劳德（J. A. Froude, 1818-1894）曾游览过属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小城镇爱戴雷特（Adelaide）。据他的记载：“吾所见者，平原当前，一河界之，此15万居民之城市，其中无一人之心中曾蓄有片刻之纷扰，但有宁静无欲，每日三餐而已。”但实际上此小城建于山岭间的高地，无任何河流界之，人口不超过七万五千，而且弗劳德去那里游览的当儿，小城正困于饥馑。弗劳德是英国首位根据未刊与已刊的原始文献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在对爱戴雷特小城的描述上差错显然，难怪被斥为天性多误，即所谓“不确实之病”。此病乃因急遽求速与轻忽失慎所至。史学家杜维运引用了这一记载后，则指出“历史的壮观

¹⁰钱理群：《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89页。

¹¹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¹²傅斯年著，雷颐点校《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史学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33页。

¹³鲁迅先生在比较自己与郑振铎的读书治学时说：“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鲁迅：《致台静农》（1932年8月15日），《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322页。

实建筑于坚实的细密考证工程上。数以千万计的历史考证学家，耗珍贵岁月于此考证专业，其有功于历史，实非远逊于撰写贯通性历史大著的少数史学家。”¹⁴

因而，文学关系史研究也离不开文献考据功夫。从现存文献材料出发，尽可能清晰地勾画文学交流的基本史实，应是中外文学关系史撰著的最基本要求。比如，经过文献史料的考辨，关注诸多处于“第一”、“首次”、“最早”地位的文学关系史实，因为它们在文学关系史上，往往会构成一个个转折点或新的坐标。笔者在撰著《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的过程中深有体会。一些新史料的挖掘可以改变现有文学交流史、译介史的论断。

史料搜集，当然不易。除了需要持之以恒，投入大量精力外，尚需有识别史料价值的能力。我们通常所见的史书报刊上的文学交流史料，有时并非完全能从正面识别出来，从它们的反面或侧面，往往可能会暗示出一种重要的交流史信息。

这种识别史料价值的方法，前辈学者已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翦伯赞先生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一文中，讲得非常明白：“还有一种史料，个别看来，没有什么意义；要综合起来，才能显出更大的价值。又有一种史料，综合起来，没有什么意义；要分析起来，才有更大的价值。再有一种史料，片面看来，没有什么价值；要比较看来，才能显出更大的意义。……帮助我们搜集这一类史料的是统计学。”¹⁵所以翦老说“我们要运用各种方法，把史料从原书中钩索出来，从正面看不出来的，从反面看，侧面看；从个别看不出来的，从综合看；从笼统看不出来的，从分析看；从片面看不出来的，从类比看。这样，我们便能网罗所有的史料了。”¹⁶

关于史料与方法的关系，翦伯赞同一篇文章中强调，研究历史，固然要有正确的科学方法，但“方法的本身，并不就是历史，也不会自动地变成历史。”“不钻进史料中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¹⁷所谓既要“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强调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是说方法不重要；反之，没有正确的方法，不但不能进行历史之科学的研究；即从事于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亦不可能。史料与方法之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刘知几云：“夫有学（史料）而无才（方法），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榱桷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旧唐书·刘子玄传》）

如何搜集整理大量的史料，目录学知识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我们研究某一个问题，如果文献史料的占有不比别人多，理解问题又不如别人高强，则必然限制了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对问题的研究假如没有独立而详备的资料准备，就会受制于别人的研究成果，加之自己的论证不足，难免产生一些主观片面的认识，最终无法解决实质问题。

¹⁴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¹⁵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¹⁶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¹⁷ 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所以，要想构建中外文学关系史或交流史的框架脉络，尽可能大量阅读初始文献史料（包括中古、近代、现代的史料），感知文学交流场的脉动，这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一个步骤。

比如，就外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而言，举凡外国作品在中国翻译的初版本、译本序跋、出版广告、据作品改编的电影海报，近现代报刊刊载的重要评论文章，作家的旅行日记、信函、交游录、自传等等均在搜集汇总之列。而要想试图探讨明清时期的英国形象问题，其范围即可包括明清年间中国对英国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采纳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充分采辑文书档案、私人笔记、日记、通信、学者著作、文学作品、翻译作品、游记、报刊杂志、民间传说、图像实物等相关资料。再进一步通过研究英国在中国的形象这个具体个案，尝试对国际理论界有关异国情调，形象学以及后现代主义中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等理论观点，进行验证与补充，亦即“新的史料”与“新的学术眼光”的互动关联。

当然，更为困难的是，如何在本土作家作品里发掘与验证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撞击的史实与成果。因为文学交流（特别是20世纪中外文学交流）过程中的影响接受与互动认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比如但丁与中国的关系，当我们搜集到了但丁作品在中国的诸多译本、改编本、评论后，中国作家在什么层面上、如何来接受这样一个意大利作家呢？为什么鲁迅先生称他为“总不能爱”的一个作家？老舍则说“使我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对巴金来说，“但丁的诗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在盛成眼里，“但丁是我们第二至圣先师”；在现代中国诗人笔下，但丁形象又是如何？均值得我们详加考述。

史料虽成“历史”，一旦将之置于历史场景中，就会成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存在。对此，钱理群先生说得好：“人们通常把史料看作是‘死’东西，把史料的发掘与整理看作是一个多少有些枯燥乏味的技术性工作，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史料本身是一个个活的生命存在，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迹，因此，所谓‘辑佚’，就是对遗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的创造者人的生命）的一种寻找与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与对话；而文献学所要处理的版本、目录、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上的人的一种书写活动与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体制与运作方式。”¹⁸

二、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任何学术研究的结构，如同建筑工程，可分为基础实施和上层结构两个方面。基础实施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相对的、长期稳定的特点。对这一研究领域而言文学与文化关系基本史料的搜集、鉴辨、审查、理解和运用，就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基础工程。我国比较文学学者的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大多数是建立在资料实证基础之上的。因此，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是其它专题性研究所无法替代的。

从史料学的建树来说，哲学、历史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学科走在了前头。

¹⁸ 钱理群：《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90页。

比较文学学科应该大力借鉴这些学科领域的优秀成果与成功经验，将史料学与学术史结合起来，企求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增添新的内容，树立一种新的标格。

文学关系史料编排与阐释，其目标是尽可能接近或还原中外文学交流历程之面貌，揭示文学交流的历史规律及对现实的启发意义。所以，以原始资料为基础，则成了资料搜集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首要问题。原始性是决定史料真实性的重要因素，而史料的真实性又是决定它的史学文献价值的首要因素。所谓史料是否真实，是想确证这份材料是不是原件？这份材料从史料学上说是不是原始资料？比如说，某人写的回忆录，单就这份材料而言，当然是原件；但是回忆录是一种事后的回忆资料，详略正常，偏误难免，从展现历史真实性的角度看，则很难称其为原始资料。有时，不经意的记载，或者更进一步说无意的记载，其史料的真实性更值得重视。

这就是说，史料的真实性（是否原件）与它的内容的真实性（历史事件）之间，关系很大。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在于它们是否为原始资料或曰原典性材料，而成为我们叙述那些历史活动的最可靠的凭据。原始资料为什么值得特别重视，就是因为它在史料的原始性以及反映的主体事实方面有绝对可靠性。

探讨文献史料的真实性，离不开史料具有绝对性与相对性并存的特点。对学术研究来讲，史料的相对性意义更加无法忽视。在此，我们参考借用李良玉教授的分类研究，提示以下几方面的情况¹⁹：

1) 史料及其所涉及的历史事实的关系，决定了其真实性的程度与效用。不同史料的产生，它和记载的事实本来关系不一样。在描述文学交流的过程中，援引相关史料时，就要把握好历史事实与作家回忆事实之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

2) 史料所展示的历史内容的主体事实与派生事实之间，在真实性方面有差异。主体事实就是与史料内容相对应的历史活动的事实，就是史料内容与它所表达的历史活动的基本目标完全一致的事实。派生事实就是史料所表达的与历史活动的主体内容有牵连的次要事实一般说来，原始资料的主体事实都是真实的。

3) 史料的学术价值具有可比性。反映同一问题的许多史料中，价值有大有小。有的原始资料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内容；有的第二手资料，也许倒很说明问题。另一来源的某份史料可能记载着这个问题的重要情况；与这个问题有关系的某份不起眼的资料中，可能记载着与另一个问题有关的重要内容。

傅斯年在论及史料中的本事与旁涉的关系时亦说：“看来像是本事最要，旁涉则相干处少，然而有时候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因为本事经意，旁涉不经意，于是旁涉有时露马脚，而使我们觉得实在另是一回事，本事所记者反不相干矣”。“史学家应该最忌孤证，因为某个孤证若是来源有问题，岂不是全套议论都入了东洋大海吗？”²⁰因而，傅斯年在《史学方

¹⁹ 参见李良玉：《文献的史料学定义与利用问题》，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²⁰ 傅斯年著，雷颐点校《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史学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39页。

法导论》之“史料论略”部分，强调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²¹

在文学关系研究中，比较不同的史料，在此过程中试图回归文学交流进程的原生态场景。有时，典型性的史料能够包蕴着丰富的文学交流信息，即如黑格尔所说的：一即多。这“一”典型的史料，隐含着普遍性、本质性的东西。另一方面，黑格尔还说：多即一。许许多多的文学关系史料，能够展示某一时期的文学交流的主导特征与内在本质。

4) 课题体现史料价值。任何史料，它的重要性都是对于研究课题而言。你不研究某个问题，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史料你可能不会去关心。它们再有价值，对你也没有意义。

有治学经验的学者都体会到，学问与其说是知识的储蓄，倒不如说是善于在书海中找到需要的知识的能力。我们也注意到，许多初涉本领域的研究者，面对大量的史籍报刊，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自己所需材料，不了解各种史料的性质和类别，也不怎么会检索大型工具书，于是发出“论文题目好定，文献史料难找”的感慨。有的花费大量精力，终于找到一大堆与课题有关的史料，由于内容形形色色，甚至相互抵牾，不知如何鉴别与取舍。还有的对史料领会不深、消化不透，不熟悉一般的引用方法。只有较好地掌握史料学知识的人，才能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比较容易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史料，才能出色的驾驭史料，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般认为，史料学有两类：一类研究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可称为史料学通论；另一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史学领域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可称为具体的史料学。就学科建设而言，两者均属必要。

简而言之，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主要包括：（1）弄清史料文献的源流类型与内容价值；（2）掌握鉴别整理的方法以确定史料真伪及价值大小；（3）提供检索利用的信息途径。同时关注文学交流史料的历史语境与评判标准，将史料学研究及学术史探讨及理论批评范式相结合，力求创造性地理解运用，发掘文学史料的潜在价值，揭示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学交流史料特点及其对现实的启迪意义。

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参考相关学科的史料学著述，确定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是：

（1）确定文学关系史料的来源，弄清楚历史文献的材料依据和作者写作的具体情况。

比如，在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史领域，以译本为中介吸取异域文化的现象比较普遍。外国作家涉及中国文化题材的写作，大都经由某一译本为依据。如王尔德之于中国老庄思想，离不开翟理斯的《庄子》译本；卡内蒂之于儒家思想，离不开卫礼贤翻译《论语》、《孟子》等中国典籍。对此，张西平教授在《汉学（中国学）研究导论》一文这样说：“中文典籍的外传，

²¹傅斯年著，雷颐点校《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史学文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页。

构成了域外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的基础。……西方大多数汉学家研究中国的文本使用的是各种西方语言的译本。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结的通道是不同的，域外汉学家们所得到的翻译的文本是不同的，这些不同的文本决定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例如，在西方汉学的历史上对《四书》的翻译就有罗明坚的译本、柏应理的译本、卫方济的译本、理雅各的译本、卫礼贤的译本、陈荣捷的译本。这些译本由于时代不同，译者的文化背景不同，所表达的《四书》的含义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真正说清楚伏尔泰、莱布尼茨的中国观，因为他们所理解的中国儒家的基础是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而到今天为止能真正读懂这本拉丁文著作的中国学者屈指可数。同样，读过龙华民的《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的学者很少，但研究莱布尼茨和‘礼仪之争’的论文和论著却每天在增加而如果读不好龙华民的这本书，是很难真正理解‘礼仪之争’和莱布尼茨的儒学观的。……同样，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认真研究过晚清时裨治文等人所办的《中国丛报》中所介绍的中国的基本情况，而正是这份报纸塑造了19世纪西方人的中国观，它为19世纪的西方汉学家提供了基本的文献。”²²

(2) 确定文学关系史料的可靠性，分析史料引用致误原因。史书有曲笔，有误记，不能尽信，必须加以鉴别，做到去伪存真，这需要了解史料来源的基础上，从作者的写作目的、态度、资料依据诸方面，确定某一著作的真实性程度。而史料引用致误的几种主要原因是：1) 史料本身无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原意造成错误。2) 史料本身无误，由于引用者推断不确而造成失误。3) 史料内容比较含蓄，由于引用者缺乏深入辨析而造成失误。4) 没有直接引用原书，造成以讹传讹。5) 因为版本不善造成史料的错误或脱漏。6) 史料本身就有错误。这数种情况，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已有成果中，均不鲜见。

(3) 明确文学关系史料的价值。根据历史文献的内容及其真伪性，可以大体上断定该文献对于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意义。同时区分文献史料的写作意图，关注当时的用途与后人作为史料来运用的异同。

(4) 对文学关系史料进行分析批评。只有分析作者的思路意图及其作品的观念内涵，才能更好地弄清楚史料的来源、可靠性和价值。对史料分析批评，是所有学科史料学的灵魂是其根本任务。

(5) 说明文学关系史料的利用方法。讲清史料的利用方法是史料的重要任务，史料的利用方法包括：史料的搜集和收藏；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史料目录学和工具书；史料被利用的情况，如某项史料被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利用了，如何利用的，效果如何，某项开始引人注目，而某项尚无人问津。史料利用方法的研究，既是方法论的问题，也是向研究者提供史料的信息，以便利研究者更快更好地利用史料。

总之，尝试进行文学关系史料学的研究，可以参照相关学科的史料学著述，确立跨文

²²张西平：《汉学（中国学）研究导论》，载朱政惠主编《海外中国学评论》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8—99页。

化语境中的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一方面总体论述，比如可以梳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学关系史料特点，归纳中外文学关系史料研究整理的成就，明确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的原则与意义，论证文学关系研究的文献史料价值，总结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史料类型，探讨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的阐释策略。另一方面，分别查考各类文献中的文学交流史料，比如中外史书、中外交通史及古书抄本里的文学关系史料，总集、别集、丛书中的文学关系史料，域外汉籍、佛典道藏、海外汉学著述中的文学关系史料，传记、年谱、日记中的文学关系史料，报纸、刊物中的文学关系史料，工具书、索引、资料汇编中的文学关系史料，等等另外，尚可对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史料整理与检索，做些必要的基础性工作。

三、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之学科价值

如上所述，文献史料的搜集、鉴辨、理解与运用，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首当其冲的学术工程。力求广泛而全面地占有史料，尽可能将史料放在它形成和演变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动态地考察，分辨其主次源流，辨明其价值与真伪。将文学关系史料的甄别贯穿于关系史写作的全过程之中，进而构建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的研究框架，这对本学科领域的学术进展，功莫大矣。

应该说，试图展现中外文学交流的原生态面貌，是本领域研究者的一个学术理想。因而中外文学交流史料的“田野调查工作”实属必要，它对揭示文学交流原生态面貌是不可或缺的。本学科研究的深入拓展，离不开史料包括地域文献史料的重新发现和利用。

钱理群先生曾考察师陀的长篇小说《荒野》的生成问题：在编入《师陀全集》前，《荒野》始终存在于《万象》杂志中，只有了解了《荒野》是怎样，为什么以何种形态存在于《万象》杂志中之后，才会对这部作品有更为具体深入的理解。钱理群对《荒野》在《万象》杂志的特殊存在方式做了描述与研究，考察了处于《万象》杂志版面空间中的《荒野》与其前后左右文本及背景材料所发生的对话关系。这种对文本与杂志版面空间之间对话关系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进入更具体的历史原生态，全面把握文本的出现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间的关系，具体了解文本产生背后的故事。²³

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也是如此。只有通过翻阅各种各样的包括书刊典籍图片在内的原始材料，才能对文学交流场有所感悟。这种感觉决定了从史料文献的搜集中，生发出关于文学交流观念的可能性及具体程度。正如有研究者所提示的那样：文学史研究从史料升华为史识的中间环节是“史感”。“史感”是在文学史史料的触摸中产生的生命感，这种感觉应该以历史感为基础，同时含有现实感甚至还会有未来感，史料正是因为研究者的这多重感觉中获得了生命。史感与史料是一种互动关系，史料是史感的基础，史感赋予史料一生命。通过两者的有机互动，史料才能真正浸入研究者的主体世界，化为研究者精神主体的有机成分。²⁴这种“史感”的获得，是一个长期浸入史料之中，既艰辛又愉悦的过程。

²³参见刘涛：《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第252页。

²⁴参见刘涛：《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第253页。

同样，没有充足的史料文献依据，就无法从事具体的个案研究。而没有充足的个案研究就无法推进中外文学关系史学科的学术进展。因而，文学关系史料的搜集及史料学研究对该学科领域的研究拓展与深化，具有战略意义。以严谨著称的卫茂平教授对此深有体会，他在《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一书的导言中说过：“我们的有些翻译文学史研究，同人文科学的不少课题一样，往往绕过原本不该绕过的个案，一路奔向终极目标，希求一网打尽。结果是，具体脉络尚不清楚，总体研究已告完成。内中空虚，自不待言。”²⁵对一些具体课题研究的忽视，重要原因就是不愿作扎实、细致、艰辛的史料文献搜集工作。与此相关的是，对现有材料的细读消化，更是切入论题，引发正确结论的重要步骤。

在涉及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河南大学刘增杰教授强调，文献是一切历史研究的根据，对相关文献占有、把握、理解的程度，往往直接决定着一篇论文或一部著作的学术质量，新的文献发掘与整理会改变现有文学史叙述，而文献的匮乏和讹误，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把文献问题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研究视野联系起来，认为只有通过文献发掘和整理，研究者才能超越原有的理论框架，获得更开阔的视野和新的看法；同时，也只有把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成果才会变得更为扎实和可靠。²⁶

这些论说也同样适用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应该说，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阐释史料的基本策略。在文学关系史料基础上提炼中外文学交流的思想话题，激活史料的历史意义及潜在价值，是课题深入开展的必由之路。因而，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的目标是中外文学交流史叙事的重要基石，而关注文学交流史研究的问题点，是提升文学关系史料学价值的重要依据。

钱理群先生论及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时说过：“实际上，我们今天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作为一个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来，不仅是着眼于学科的基础建设，不仅是对学术商业化所带来的学风的危机的一种抵抗与坚守，强调学术研究的科学性，重新提倡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的鲁迅学术传统，同时也是包含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即把现代文学的文本还原到历史中，还原到书写、发表、传播、结集、出版、典藏、整理的不断变动的过程中，去把握文学产生与流通的历史性及其时代政治、思想、文化的复杂关系。”²⁷

同样，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关系史料学研究，作为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基础学术工程，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还原文学交互影响的历史进程，也是建构科学的方法论与良好学术风气的重要保证。

²⁵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²⁶ 参见刘涛：《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第249页。

²⁷ 钱理群：《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第91页。